

大舅的三封信

■何亮

上,村上的积极分子和民兵把土坯掀开,忠惠才出来,到各村做群众工作,鼓励大家坚持对敌斗争。”

1949年,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残敌。北方革命老区的大批干部南下建立红色政权。大舅此时已结婚成家,在县城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他不顾父母担忧和老祖母的劝阻,主动请缨南下,还担任郟城南下干部的领队。离家前,大舅叮嘱我母亲代他照顾老人,扶养年幼的弟弟妹妹,随后与同为革命同志的舅妈王巧云一起踏上征途。

这一走,大舅再也没有回到故土。1950年4月,大舅从江西上饶给我母亲写了第一封信。在信中,大舅简要谈到自己在菏泽大屯参加集训后,经徐州过蚌埠到合肥,然后步行千里才到达上饶,已在铅山县开展工作。末尾写道:“我离家远了,你要对家庭多照顾一下,多向咱祖母,父母解释一下,不要挂念我。待一二年我会回家看望父母,这期间要靠你照顾好老人,扶养咱小弟弟小妹妹。”

大舅的第二封信是写给我父亲的。他此时已由江西转往贵州,应是从

我母亲的去信中得知她结婚的消息以及我父亲的情况,因而特意致信。我父亲原是第二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连队指导员,淮海战役中他负伤致残,之后转业到菏泽地委组织部工作。大舅与他主要聊工作,也讲到新解放地区的一些情形,还讲了当下中心工作就是剿匪、征收公粮、春耕生产三大任务,尤其剿匪,是当务之急。

舅妈曾说过,当时贵州匪患相当严重。大舅他们一批男同志先随部队由遵义前往桐梓。她和几位女同志稍后过去时,是由部队派卡车架着机枪护送。土匪出没无常,抢劫军用物资的事件时有发生。大舅当时担任桐梓县高桥区(今高桥镇)区委书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展工作,可见处境之艰险。但他凭借过人的勇气和智慧,深入山村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成立农协,很快就在高桥区打开局面。

大舅的第三封信写于1950年8月,是写给我母亲的。信中说进军大西南的任务已完成,四川已获解放,“我的工作又有变动,冀鲁豫的干部全部随军到四川去”“今后不要来信了,我到四川后

再给你去信”。信末仍是嘱咐我母亲把这些情况转告家中长辈,让老人放心,并照顾好弟弟妹妹。

也就是在这封信寄出后不久,去四川还未成行,大舅就在下乡开会途中敌埋伏牺牲了。他的一位战友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高桥区解放后,敌人表面上没掀风浪,暗地里由匪首叶树椿四处串联策划,伺机报复。1950年8月的一天,忠惠他们几个人到桥头开会,成立农协小组,叶树椿打听到忠惠要走的路线,在恩滩拐弯的地方设伏,向他开枪。忠惠掏出手枪一边还击一边喊冲。他跑得太快,冲在最前,敌人的枪都对他打。忠惠光荣地牺牲了,区队的刘绍贵也牺牲了,公安员周继珠负伤滚到河里才幸免于难。”大舅在信里说的“待一二年我会回家看望父母”,最终未能兑现。

我读大舅的这些来信,感伤是免不了的。然而转念再想,正是因为有大舅这样怀着坚定信仰的无数共产党人,一步步走向艰难、危险,甚至要流血牺牲的前路,才有党旗的永远鲜艳,才有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今天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大舅感到欣慰。

潮汐记得

■庄行



陈磊绘

“嗯,”他打断了我的介绍,“你第二年冬天写的信里提到,你想考学,在值班的时候学习文化知识,被班长批评了,你委屈了很久。”

我怔住了。那是我一次深夜给妈妈写信时,一句带着怨气的倾诉。我记得那晚的心情,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一个年轻人的上进心,尤其盼望父亲能对我说句话。

他依旧望着海,声音混在海风里:“那句话,我记了很久。”他忽然转过头,清晰而沉稳地说:“你班长批评你,批评得对。”

我的心像被海风“啜”了一下。“岗位就是战位,一分一秒都不能丢。你想上进、考学,是好事,但什么时候该干什

么,心里得有杆秤。”

父亲的话像礁石一样硬,令我一时无言。那一刻,当年那股无处诉说的愤懑,那个觉得“连自己父亲都不向着我”的念头,又隐晦浮现。

入夜后,阳台上咸湿的空气里,父亲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他喝了几口茶,然后像是自言自语:“以前,我也遇到过想不通的事。执行任务时,一封家书要走1个月。等信的时候,我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收到你妈妈写的信,说家里一切都好,孩子会叫爸爸了。”他顿了顿,“信里越是轻描淡写,我越知道不容易。可我能说什么?穿上这身军装,有些话就得咽下去,有些担子就得扛起来。”他看向我,眼神在夜色中变得复

一把炒面暖寒冬

■殷琦璐

★情到深处

清晨,我走进食堂时,分餐台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腊月天寒,炊事班近几日常会做腊八粥。

“班长,多来一点行不行?”排在前面的一级上士老陈笑着把碗递过去。

“人人有份,管够!”炊事班班长舀起一大勺粥,稳稳倒进老陈碗里,腾腾的热气顿时弥漫开来。

我捧着碗坐下,低头闻了闻腊八粥的香气——那是豆子煮熟后特有的豆香,加了黑芝麻后更加浓郁。喝一口,暖流从舌尖蔓延到胃里,使我整个人都舒展开来。与此同时,远在家乡的姥姥常做的却是炒面。

每年冬天,姥姥都会做炒面。将小麦粉倒入铁锅,加少许盐,慢慢焙成浅褐色。要吃时,将炒好的面盛进碗中,用热水一冲,再依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坚果、葡萄干、红糖等。朴实的味道与温热的口感凝结成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乡情,也藏着姥姥心中一段满含牵挂的过往。

70多年前,战争的硝烟从朝鲜漫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响彻太姥姥居住的村庄。那年冬天,乡亲们总在村道上谈论着前线的消息,村头的大喇叭里经常播报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姥姥的哥哥王发奎那时总趁着帮太姥姥干活的间隙,偷偷打听参军的消息。

姥姥告诉我,195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王发奎离开了家。太姥姥将他送到村口,看着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渐行渐远。后来听邻居传回的消息,他们在短暂的集结后,便随部队北上,跨过了鸭绿江。那一年,他17岁。

“那时候家里哪有面粉啊,你太姥姥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糜子磨了,连夜炒熟,装在布袋子里,交给了他。”

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炒面,我曾查过资料:为解决志愿军官兵吃饭问题,当时的东北军区提出了“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用一定比例的小麦、大豆、高粱米或玉米炒熟,磨碎加食盐制成炒面,供应前线。炒面虽然难以咽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每人随身背一袋,可以填一填肚子。

“你舅姥爷说,那炒面吃得人直呛。”姥姥回忆,“干嚼咽不下去,得就着雪。一把炒面一把雪,在嘴里和成糊糊,冰碴子扎得牙根疼。”

舅姥爷还告诉她,就是这扎牙的炒面糊,在零下40摄氏度的长津湖,在子弹呼啸的上甘岭,支撑着无数年轻的身体。饿了,抓一把;冷了,抓一把。小布袋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怕冻硬了,更怕丢了——那是命。

战斗的间隙,舅姥爷时常会唱起家乡小调。歌声断断续续,却总能让身边的战友露出久违的笑容。一次行军途中,舅姥爷的布袋被磨破了。虽然里面

早就没有炒面了,但他仍蹲在战壕里,借着微弱的月光,一针一针地缝。同班的战友笑他:“小王,命都快没了,还顾得上这个?”

他头也没抬,说:“这是俺娘缝的。”后来那个战友和舅姥爷一起回到家乡,把这件事讲给了姥姥听。

回国后不久,电影《上甘岭》开始拍摄。知道消息的舅姥爷在剧组当了一名群众演员。拍摄插曲《我的祖国》时,舅姥爷与大家一起合唱“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优美的曲调让从战场归来的舅姥爷深深为之动容。

前几天,姥姥寄的炒面到了,里面加了红糖芝麻。我按照家中常用的方法,给排里的战友每人冲了一碗。

重庆的战士大陈吸溜一大口,眼睛亮了:“排长,这个味道越嚼越香呢。”山东的战士大兴咂咂嘴:“像俺奶奶烙的饼,透着妻子原本的味儿。”

听着战友们吃炒面的声音,我心头一热,给姥姥发了条信息,“面收到了,大家都说好吃。”从就着雪块、掺着粗粮的干炒面到如今这碗香甜的炒面糊,炒面的味道与口感早已不同,但一代代人坚守战位的初心却从不曾改变。

温柔的目光

■马静

★说句心里话

产假已近尾声,我坐在炕沿上,把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塞进行李箱。金属拉链划过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母亲抱着孩子站在门边。我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她,目光正撞上她那温柔而复杂的眼神。

我起身,走过去说:“妈,别难过,等下次休假我就又回来了。”

“没事,就是突然感觉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母亲挤出一丝微笑。她转头逗着怀里的外孙女,试图隐藏不舍的情绪。

我本想多安慰母亲几句,又怕那些笨拙的词句,让她更添伤感,终究只留下沉默。

母亲总是这样,期盼我休假回家,舍不得我离家归队。当兵这些年,母亲就是在一次次迎接与送别中,看着我走入军营并结婚生子。在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她把思念攒在心底,只有等我回家时才能细细倾诉。

半年前,我生下女儿。同为军人的丈夫护理假期后期需返回部队,我便带着女儿回了老家。我自上高中开始便在学校寄宿;上大学以及当兵后,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现在想来,这次产假是在家陪伴母亲时间最长的一次。

说是陪伴母亲,其实一直是母亲在照顾我和孩子。生产后,我总在深夜惊醒,有时是因为听见女儿细微的哭声,有时是莫名心慌,甚至会下意识地把食指凑到女儿鼻前,试探那温热的呼吸。初生的孩子,还未形成规律的睡眠,夜醒频繁且很难再次入睡。不知多少个夜晚,在我极度疲惫时,是母亲在小夜灯下抱着孩子哄睡;无数个清晨,又是母亲将早醒的孩子抱到外屋,只为让我再多睡一会儿。

如今又唱给了我的女儿。

我归队那天,母亲一大早就起床包饺子。当我抱着刚睡醒的女儿来到厨房时,饺子已经整整齐齐摆在案板上。

“妈,您怎么起得这么早?”我揉着眼睛,心疼地问。

“上车饺子下车面,今天你回部队,咱们一定要吃饺子。一会儿我照顾孩子,你赶紧去洗漱吃饭。”母亲抬头,脸上挂满了笑意。

酸菜馅饺子,承载着东北孩子的“乡愁”,也一直是我的最爱。清晨的阳光倾斜着照进厨房,为母亲忙碌的身影镀上了一圈暖黄色的光晕。我看着她用长柄木勺轻轻搅动锅里的饺子,熟练地添水,点三次凉水,直到饺子在锅里浮浮沉沉。

“妈,谢谢您。”我忍不住上前,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住母亲。太多的话堵在喉咙里,最终都融进了这个浅浅的拥抱。

母亲先是一怔,转身对我说:“谢什么。以后你也会无条件爱着自己的孩子。”饺子还是熟悉的味道,酸菜的鲜香混合着油脂的醇厚,一口咬下去,滚烫的汤汁在舌尖绽开。母亲坐在对面,看我吃得香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临行时,母亲提着保温盒站在门口说:“这里面给你装了饺子,带着路上吃。”

“妈,我早上吃多了,实在吃不了。”我看着母亲手里的保温盒露难色。“那就拿着回部队再吃,听话!”母亲的眼睛里亮晶晶的,像盛着一汪晨露。

汽车发动的那一刻,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背过身去,偷偷用袖口擦了擦眼角。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坚韧的藤蔓,紧紧缠绕着我前行的路。

车窗外的风景向后退去,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个保温盒。

母亲看着我长大,看着我远行,看着我成为孩子的母亲。无论走多远,我都

★那年那时

我的大舅已牺牲多年,当然不会再写信。

信是1950年写的。当时大舅从鲁西南革命老区去南方充实新建的红色政权。离家后,大舅给他在菏泽工作的妹妹和姐夫,即我的母亲和父亲,写了3封信。

大舅名叫忠惠,山东郟城人。他12岁就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跑腿送信,15岁当了负责30多个村的郟城第五区儿童团长,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担任郟城第十区区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冀鲁豫边区大举进攻,试图攫取胜利果实。在我军主力部队战略转移至黄河以北时,大舅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我在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回忆中看到,为了躲避敌人在各村像篦子梳头一样的搜捕,大舅藏在远离村庄的坟地里。“用一副薄棺材,再用土坯垒成个假坟,人就藏在那里,嚼干粮过日子。晚

★两代之间

父亲是一名曾在青岛服役的老海軍。自我有记忆起,他对工作的热情似乎远胜于对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时常缺席;对于往事,他也很少提及。我们之间,似乎隔着一片名为“疏离”的安静海域。

高考后,我立志要用自己的方式,闯出一片天地。我填报了入伍志愿,最终被分配至南海之滨的三亚服役。一北一南,青岛与三亚,两片截然不同的海。相距遥远的不仅是地理位置,还有我们本就稀薄的语言。

服役的两年任务繁重,南海上的大风大浪锤炼着我,与家的联系主要依靠书信和信号断断续续的电话。起初,我的信写得琐碎而笨拙,抱怨南国太阳的毒辣,描述训练的枯燥和辛苦,倾诉深夜值班时无法排遣的乡情。母亲的回信总是叮嘱冷暖与絮叨家常,而父亲的话,仿佛只是信的“背景音”。母亲总在末尾写道:“你爸看了,说让你多喝水”“你爸说,晒脱皮是常事,掉皮掉肉不掉队才是军人本色”。

那两年,我心里有些失落,觉得父亲并不关心我的生活。母亲转述的只言片语,让我感到遥远而模糊。

后来我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新的岗位。第一次休假,一个念头在我心中萌发:我要带父亲去一趟海南岛,去我曾守护过的那片海看看。这并非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更像是我递给父亲的一份请柬,邀请他走进儿子那几年独自经历过的海风与烈日。

飞机开始下降时,父亲的侧脸向舷窗。当那片熟悉的蓝色玻璃海扑入眼帘,我忽然想到,小时候总是父亲拉着我去赶海,而这是我第一次带他去看海。

住处的阳台正对着海湾。父亲放下行李,走到栏杆边。那姿态与老照片中他立于舰艇甲板的身影相差无几。我指向远方的海岸线轮廓,试图开启话题:“爸,那边就是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

家庭秀

爸爸的臂弯像山岗帽檐下的笑意在流淌妈妈的指尖如有春风绕眼底的温柔酿成蜜糖我是山间的云朵摇曳晃晃是春风里暖暖的小太阳我们的笑声不停响如一首歌谣轻轻唱唱营区晚霞一片金黄那里有爸爸爱的目光和妈妈笑里的港

李贝贝配文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干部张郭的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亲。图为张郭在休息时间陪伴妻女。

黄振宇摄

